

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马 晓 林

内容提要：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关键词：元代 祭祀 岳镇海渎 道教

岳镇海渎祭祀，起源于上古的山川崇拜，是祭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国家祀典。自汉代以来，被历代王朝因循崇祀，岳镇海渎已经成为“一套象征王朝正统性的经国体野的文化符号”^①。同时，自北朝隋唐以来，岳镇海渎祭祀就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元代，岳镇海渎祭祀盛极一时，《元史·本纪》中频繁记载，相关石刻史料层出不穷，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又恰恰出现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且岳镇海渎也是首个被蒙元统治者采行建制的汉地传统国家祀典。^②以是观之，元代的岳镇海渎祭祀问题尤值得深入探讨。

长期以来，学界对元代祭祀的研究多集中在太庙、烧饭、天妃（妈祖）等专题，^③涉及岳镇海渎的大多只是概述性的文字。^④进入21世纪，首先是日本学者森田

① 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日〕池内功：《フビライ朝の祭祀について》，平成二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总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における正统と异端》（二），1991年，第55—70页。

③ 相关研究概况可参刘晓《元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185页。

④ 黄时鉴《元代的礼俗》，《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年；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元代卷（上）》第12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18—1038页。

宪司开始论及元代岳镇海渎。^①随后,樱井智美对这一问题颇为关注。^②国内也始有学者涉及这一课题。^③这些研究有的是以某一事件为重点加以论述,有的是以某一地域为中心进行考察,唯森田氏是全面的梳理,然只涉及代祀这一种形式,且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本文拟从《元史·祭祀志》出发,钩稽石刻史料及元人诗文,以制度的形成、祭祀活动为重点,对元代岳镇海渎祭祀做系统性的考察。

一 岳镇海渎祭祀制度的形成

在大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就有派遣使者代祀岳渎的举动。如,1246年,拖雷寡妻唆鲁禾帖尼命道士张善渊代祀中岳、西岳;^④1251年,蒙哥汗命全真道掌教李志常代祀五岳四渎;^⑤1256年,身为藩王的忽必烈因创建开平城,派遣使者代祀五岳四渎。^⑥但要论制度的形成,还要从忽必烈即位算起。

由忽必烈即位(1260)到成宗大德二年(1298),是岳镇海渎祭祀制度的形成期。概而言之,大蒙古时期,祭祀对象只有五岳、四渎;忽必烈即位初年,加入东海,至元二十八年(1291),为五岳、四渎、四海加封号,是为正式定制;成宗大德二年(1298),增入五镇,^⑦完整意义上的岳镇海渎祭祀制度最终形成。

《元史·祭祀志》中关于岳镇海渎分列两条,一条题为“岳镇海渎”,其实际内容是“岳镇海渎代祀”,即派遣使者前往各地的祠庙举行祭祀;另一条题为“岳镇海

①〔日〕森田宪司《元朝における代祀について》,《东方宗教》第98号,2001年。

②〔日〕樱井智美《〈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李治安主编《元史论丛》第10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クビライ华北支配の一形象——怀孟地区の祭祀と教育》,《骏台史学》第124号,2005年3月;《元代の北岳庙祭祀とその遂行者たち》,气贺泽保规编《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社会——北朝隋唐を中心に》,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113—142页。

③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第5章《元代的南海神庙》,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7—242页。周郢《全真道与蒙元时期的五岳祀典》,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84—292页。刘江《元宪宗元年李志常代祀岳渎考》,熊德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8—387页。

④王恽《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公墓碣铭》,《秋涧集》卷六一,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199页。

⑤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三,《道藏》第19册,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修终南山三清宫记》,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18—521页。

⑥《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道家金石略》,第865页。参樱井智美《〈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

⑦《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0—1901页。亦见《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元刊本,第54—55页;阎复《加封五岳四渎四海诏》,《元文类》卷九,《四部丛刊》本。

渎常祀”，即岳镇海渎所在地的地方官每年前往祠庙祭祀。^①实际，除代祀、常祀两种形式外，还存在着因事专祀的情形。下分述之。

（一）代祀

代祀，在整个蒙元时期出现最早、举行最频繁，也是蒙元朝廷最重视的一种祭祀形式。前述森田宪司文专论代祀，然尚有未尽之处，许多问题有待澄清，本节拟作进一步探究。

元世祖朝，代祀的举行极其频繁。诚如明人王圻所称“岳镇海渎，元世祖时，代祀几无虚岁。”^②据《元史》，忽必烈在位的35年间（1260—1294），有26年举行过代祀。而新发现的石刻资料证明，《元史》中失载的至元元年^③、至元七年^④也是举行过代祀的。无疑《元史》的记载存在脱漏。

《元史·祭祀志》云：“岳镇海渎代祀，自中统二年始。”^⑤而一通碑文显示，中统元年（1260），“宣差太医提点许国桢奉皇帝圣旨里致祭五岳四渎”^⑥。另一碑文也有类似记载“特遣提点太医院事许国桢驰驿遍告后土岳渎”^⑦。“许国桢”当即《元史》中的“许国祯”。《元史》本传云，忽必烈在藩邸，征国祯掌医药，后从征云南、攻鄂州，世祖即位，“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⑧。以此相证，则忽必烈即位之年便有遣使代祀之举无疑。《祭祀志》失载，可能与许国桢是医非道的身份有关，或许他负有特殊使命。

中统元年，是许国桢一人前往各地代祀，中统二年则有了数路使者。据当时人王恽记述，中统二年秋，全真道士刘志真“奉旨驰乘祝香岳渎”^⑨；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二年十月，“遣道士訾洞春代祀东海广德王庙”。可知忽必烈派出了数路使者，刘志真、訾洞春就是其中的两路。

元世祖开始，代祀形成了制度。制度中祭祀礼物、仪式等内容，《祭祀志》有载，因细节较繁琐，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探讨。本文的论述以祭祀活动为中心。

1. 代祀周期。基本上是每年一次。具体月份并不固定，但以正月为多。^⑩

①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第1900页，第1902页。

② 《续文献通考》卷七四《郊社十·祀山川》，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万历刊本，1979年。

③ 《大朝投龙记》，《道家金石略》第562页。《济祠投龙简灵应记》，《道家金石略》第572—573页。

④ 《御香天坛投简感应碑》，中原石刻艺术馆编《河南碑志叙录（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89页。

⑤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第1900页。

⑥ 《祭鹤山神应王庙记》，《道家金石略》，第1090—1091页。

⑦ 《祭济渎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8976页。

⑧ 《元史》卷一六八《许国祯传》，第3963页。

⑨ 《故普济大师刘公道行碑铭》，《秋涧集》卷五三，第135页下。

⑩ 如至元九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年，这9年都是正月。

2. 代祀路线。欲考代祀路线，先须明了祭祀地点。

岳镇海渎祭祀地点表

名称	祭祀地点	
	1276 年前	1276 年后
东岳泰山	泰安州	
南岳衡山	河南府（遥祭）	潭州路衡山县
中岳嵩山	河南府路登封县	
西岳华山	奉元路华州	
北岳恒山	保定路曲阳县	
东渎淮渎	南阳府唐州	
南渎江渎	莱州（遥祭）	成都路
西渎河渎	河中府	
北渎济渎	怀孟路孟州济源县	
东海	般阳府路莱州	
南海	莱州（遥祭）	广州路
西海	河中府	
北海	登州（遥祭）	怀孟路孟州济源县
东镇沂山	益都路莒州沂水县	
南镇会稽山	河南府（遥祭）	绍兴路会稽县
中镇霍山	晋宁路霍州	
西镇吴山	巩昌府陇州	
北镇医巫闾山	广宁府路	
后土	晋宁路临汾县	

资料来源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第 1900 页；程钜夫《雪楼集》卷一《皇太后遣使祭诸神文一十九首》，台湾《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 137—140 页。

西海附祭于河渎，北海附祭于济渎，因而实际祭祀地点共 17 处。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书省 7 处，河南江北行省 3 处，陕西行省 2 处，四川行省 1 处，辽阳行省 1 处，江浙行省 1 处，湖广行省 1 处，江西行省 1 处。^① 没有涉及的是岭北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以及宣政院辖下的西藏。可见，岳镇海渎遍布宋金旧地。这个地域布局，多少可以反映出岳镇海渎对于元帝国的一个重要意义——统御宋金旧地。

下面考察代祀路线。《元史·祭祀志》称岳镇海渎代祀：

凡十有九处，分五道。后乃以东岳、东海、东镇、北镇为东道，中岳、淮

① 此处所据行省疆界范围，时间定位在世祖末期以后。因为迄世祖末，各行省才有了确定辖区和疆界范围。参业师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 页。

渎、济渎、北海、南岳、南海、南镇为南道，北岳、西岳、后土、河渎、中镇、西海、西镇、江渎为西道。既而又以驿骑迂远，复为五道。

代祀路线经历了五道——三道——五道的过程。由于史料记载粗疏，起初的五道已经无法考证。有可能是简单地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划分为五道。这样的路线极为不便，因此改为三道。

五道改三道的的时间，史料中也没有明载。但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重要的临界点，那就是至元十三年（1276），在此之前元朝尚未统一南宋，南岳、南镇、南海、南渎都在南宋境内，只能遥祭。以1276年为临界点，考察三道路线的合理性，则可知，由五道改三道必在1276年后。然而，三道的每一道路线过长，有“驿骑迂远”之弊，后来经过重新整合，复为五道。大德三年（1299）阿闾赤、卢摯的代祀路线为：中岳、淮渎、南岳、南海。^①路线较三道简约，可知此时已经复改五道。总之，五道改三道的的时间，不早于至元十三年（1276）；而三道复改五道的的时间，不迟于大德三年（1299）。三道至多使用了23年（1276—1299）。

关于后五道路线的记载就很丰富了。兹参酌各类史料，归纳如下。

中南道：中岳、淮渎、南岳、南海^②

东南道：北岳、济渎、北海、南镇^③

西道：中镇、后土、河渎、西海、西岳、西镇、江渎^④

东道：东岳、东海、东镇^⑤

北道：北镇^⑥

尚需补充一点，按五道派出使臣为通常的做法，特殊情况也是存在的。如东镇，其地在东岳、东海之间，元人许有壬记彭大年代祀东岳、东海，而不书东镇，^⑦虞集《送赵虚一奉祠南海序》（延祐六年）、^⑧刘源《祀恒岳记》（至正十一年）指称岳镇海

① 卢摯《代祀南岳记》，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五，雪堂丛刻本，第29页b。

② 吴当《送李黼修撰以早请祷代祀嵩衡淮海》，《学言稿》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刘源《祀恒岳记》（至正十一年），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一三，清光绪三十年刻本，第93—96页；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7页。陈旅《送王致道代祠北岳北海济渎南镇》，《安雅堂集》卷二，《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67页。

④ 文允中《代祀中镇崇德应灵王记》（至正十三年），《霍山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页。马祖常《和袁伯长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岳镇江河后土》，《石田文集》卷三，《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565页下。

⑤ 《李绣代祀东镇记》，潘心德主编《东镇沂山》，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年，第231—232页。《代祀沂山记残碑》，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⑥ 《满洲金石志》卷四、卷五收录元朝代祀北镇碑文11篇，提到代祀路线时皆只书北镇，《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3册。

⑦ 许有壬《钱彭大真人代祠东岳、东海》，《至正集》卷一一，《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75页上。

⑧ 《道园学古录》卷四六，《四部丛刊》本。

渎,皆独缺东镇,可知,东镇的代祀可能间有停断。^①再如,元末有遣使南海南镇,其余十七处合祭的做法。^②遇非常事件须便宜选择路线,这种“因事专祀”的情况将在后文探讨。

3. 发令者。在大蒙古国时期,遣使代祀的发令者不仅限于大汗。前文曾述1246年唆鲁禾帖尼遣使代祀,当时唆鲁禾帖尼的身份只是贵由汗的叔母。另一则史料显示,1250年,唆鲁禾帖尼派遣一位杨姓道士“随路于五岳四渎,但有圣像房子里,代礼行降御香”^③,此时下距蒙哥即位尚有一年,唆鲁禾帖尼的身份仍然是诸王妃子。而1258年,身为皇太弟的忽必烈也曾遣使代祀。可见,大蒙古国时期大汗没有独占岳镇海渎祭祀的权力。蒙古皇室、贵族祭祀岳镇海渎主要是出于祈求福祉、笼络民心的目的,而未认识到岳镇海渎作为国家祭祀的崇高地位,这与他们当时对汉文化粗浅的认识程度是契合的。

而到了元世祖朝以后,随着蒙古人对汉文化认识程度的加深,遣使代祀的权力逐渐收归皇帝所独有。早在忽必烈即位次年——中统二年(1261),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有诸王遣使“祝香四岳”,忽必烈问中书省官此事是否得当。省官婉辞以对:“此无他,止是争欲徼福耳。若大制一定,此事自革。”^④这则史料反映出,忽必烈已经意识到皇帝对岳镇海渎祭祀的独享权,之所以如此,一是他较其他蒙古人熟谙汉法,二是他刚刚得到汗位,对合法性问题较敏感。至元九年(1272)的代祀,使臣由燕王真金派出,实际上,真金遣使代祀是奉了其父忽必烈的旨意。^⑤但诸王祭祀岳镇海渎的情况仍存在。据吴澄《天宝宫碑》载,真大道教道士张清志曾经“为永昌王(只必帖木儿)祈福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⑥,时在至元十九年(1282)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之间,^⑦未见有罪责。而北安王那木罕于至元二十三年、至元二十四年两度遣使降香岳渎,^⑧至元二十四年权臣桑哥诬陷安童,罪名就是安童明知北安

① 此承吴小红先生提示,特致谢忱。另,元代东镇庙碑刻可参吉星田《东镇庙碑目》元碑部分,吴德升主编《东镇沂山》,临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朐委员会,1991年,第12—14页;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第420—421页。

② 《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③ 《重阳延寿宫牒》,《道家金石略》,第768页。

④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〇,第369页上。

⑤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载“敕燕王遣使持香旛,祠岳渎、后土、五台兴国寺。”(第140页)《皇太子燕王嗣君碑记》亦有“代命”之语(《道家金石略》,第1102页)。

⑥ 《道家金石略》,第828页,亦见《吴文正公集》卷二六,《元人文集珍本从刊》本,第462—464页。

⑦ 《道家金石略》第827—829页。碑文云,时张清志33岁。张清志之生卒年无法确考,然据碑文,张清志26岁至33岁间七祖李德和卒,案,李德和卒于至元十九年(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故张清志33岁之年应在至元十九年至至元二十四年之间。

⑧ 《皇子北安王降香记》(至元二十三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第100页。《皇子北安王降香记》(至元二十四年,存目),黄叔璥《中州金石考》卷五,《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704页下。

王僭祭岳渎而“不以闻”^①。可见北安王可能遭到了追究。^②这与他特殊的身份地位有关。北安王那木罕是忽必烈幼子,《史集》称,忽必烈曾经有意让那木罕继承大位,但后来属意于真金。^③尤其是那木罕有了兵败被俘的经历后,忽必烈更是将他排除在了继承者之外。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金病逝,随后两年那木罕祭祀岳渎,有争储之嫌。忽必烈对这一举动不会宽容。而岳渎禁令正式写入诏旨,是在成宗时。成宗大德元年六月,“诸王也里干遣使乘驿祀五岳、四渎,命追其驿券,仍切责之”也许正是这一事件,导致次年——大德二年二月正式颁布诏旨,“诏诸王、驸马毋擅祀岳镇海渎”^④。

4. 使臣的人选。《祭祀志》云:

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臣言曰:“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⑤

在忽必烈早期,因袭了大蒙古国时期的旧例,代祀主要由道士担当,有时以汉官为副。《本纪》的记载,对代祀使臣大多是不具名的。这种情况是符合当时史官记事的习惯的,而具名的情况多是因为该次代祀与旧例有所不同,即出现特例或者开先例。^⑥

在元世祖朝中后期,情况起了变化。至元十八年(1281),发生了史上著名的佛道大论争。忽必烈借机对权力过度膨胀的道教势力进行打压。^⑦紧随佛道论争之后的至元十九年、二十年,都没有代祀岳镇海渎的记载。道士不再被委任,代祀的人选出现了困难,这两年的代祀很可能因此而取消了。至元二十一年(1284),代祀重现于《本纪》:“遣蒙古官及翰林院官各一人祠岳渎后土”^⑧,其中着意强调了代祀使臣的身份——蒙古官、翰林院官。道士原本一直是代祀使臣的首选,这时却不在代祀使臣之列。

①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丞相东平忠宪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年,第12页。

② 关于那木罕僭祭岳渎事件,参刘迎胜《从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题》,《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26页。

③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2页。

④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第411、417页。

⑤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第1900页。

⑥ [元]潘昂霄《金石例》卷一〇《史院纂修凡例·岳渎降香》:“某日遣使持香祠五岳四渎后土,如衡山始入版图、东海南海始遣使,皆书。至岳渎海加封,则先书加五岳四渎四海封号,某神加某号,详书之毕,却书分遣使臣奉制辞香币祠于庙所。如西海北海附祭,亦合书于初年,后不复书。或专遣一使遍行,则特书。”《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569页下。

⑦ 参(日)中村淳《モンゴル時代の道佛論争——クビライの中国支配への道》,《东洋学报》75—3,1994年。

⑧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第264页。

至元二十一年以后,在张留孙等南方正一道士的斡旋下,道教的困境渐渐有所缓和。^①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重新规定了使臣的人选“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道士再次回到了代祀使臣之列。当年十二月,即遣全真掌教张志仙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②但是,道士在代祀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世祖朝前期“遣道士,或副以汉官”是以道士为绝对的主导,而至元二十八年的规定是“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也就是说是以重臣(主要是蒙古人)为主导,汉人位居其次,汉人可以是名儒、也可以是道士。道士在代祀岳镇海渎中的地位被大大降低,这样的趋势在世祖以后诸朝愈加明显。

(二) 常祀与因事专祀

常祀,是由岳镇海渎所在地的地方官即其地举行祭祀。因每年一度,故又称“岁祀”。

《祭祀志》称“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在至元三年(1266)。实际上,这只是“定制”,据《元典章》,常祀活动在中统元年(1260)即开始。^③当时忽必烈正全力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而国家祭祀未暇定制,为了稳固汉地,故将汉地(金朝)原有的祭祀旧例进行简单重申。^④六年后,至元三年(1266)夏四月,才正式定立了详细的常祀制度:

正月东岳镇海渎,土王日祀泰山于泰安州,沂山于益都府界,立春日祀东海于莱州界,大淮于唐州界。三月南岳镇海渎,立夏日遥祭衡山,土王日遥祭会稽山,皆于河南府界,立夏日遥祭南海、大江于莱州界。六月中岳镇,土王日祀嵩山于河南府界,霍山于平阳府界。七月西岳镇海渎,土王日祀华山于华州界,吴山于陇县界,立秋日遥祭西海、大河于河中府界。十月北岳镇海渎,土王日祀恒山于曲阳县界,医巫闾于辽阳广宁路界,立冬日遥祭北海于登州界,济渎于济源县。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既有江南,乃罢遥祭。^⑤

简单地说,就是将岳镇海渎按照方位分为东西南北中五组。以东配正月,南配三月,中配六月,西配七月,北配十月。具体日期是春夏秋冬四立日、土王日。常祀与代祀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常祀实行之初就不是由道士主持,而是由地方长官率领属下官员行祀。

《元典章》载元世祖谕英宗即位期间,为登基、改元、上尊号、立太子等大事而

① 参〔日〕高桥文治《张留孙的登场前夜——发给文书から見たモンゴル時代の道教》,《东洋史研究》56—1,1997年。

②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第354页。

③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载“庚申年(中统元年,1260)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第54页下。

④ 金朝旧例见《大金集礼》卷三四《岳镇海渎》,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刊本。

⑤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第1902页。个别标点为笔者所加。

颁布的诏书中都会强调常祀制度，如大德九年六月立皇太子诏、大德十一年五月登宝位诏、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至大改元诏、至大二年二月上尊号诏、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登宝位诏、延祐四年闰正月建储诏、延祐七年三月登宝位诏。而且诏书中规定，除常祀外，诏书到时，地方官也须“择日致祭”^①。

代祀、常祀，都是周期性的祭祀。从元世祖朝开始，也出现了因事专祀的情况，也就是遭逢非常事件而临时采取的祭祀。

所谓非常事件有两类。一类是遇天灾而祀岳镇海渎。天灾主要是水、旱、蝗、疠疫等。例如，至元十年（1273），因为“随路霖雨不止”，大司农司通过中书省上奏，乞求依照旧例“霖雨不止，祈祠山川、岳镇海渎、社稷、宗庙”施行，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②又如，为消弭连年蝗灾，冬季“致祷岳渎”祈雪。^③另一类是逢人事而祀岳镇海渎。如，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遣使代祀岳渎”^④，便是因平定南宋、国家统一而祀。再如，“太子（真金）尝有疾，世祖临幸，亲和药以赐之，遣侍臣李众驰祀岳渎名山川”^⑤，则是为皇室福祉而祀。

因为存在遇事而祀的情况，所以偶尔会出现一年二祀的现象。如至元十三年五月“遣使代祀岳渎”，而当年七月又“遣使持香币祠岳渎后土”^⑥。至元十四年二月“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五月又遣真人李德和“代祀济渎”。至元二十八年，分别在二月、十二月祭祀岳镇海渎。遇事而祀，也是导致祭祀月份不固定的一个主要原因。事有缓急，如至元九年，皇太子真金在忽必烈授意下遣使代祀岳渎，就有庆祝“蝗妖灭息，年谷丰登”的目的。^⑦

元文宗时成书的《救荒活民类要》，载有如下文字“京师孟夏以后，旱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镇海渎，又山川兴云致雨者，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宗庙。每七日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地方上霖雨不止，“祈祀山川、岳镇、社稷、宗庙”^⑧。笔者通过比对发现，这段文字实际是《大唐开元礼》的节录，^⑨审理冤狱、掩骼埋胔、北郊、七日一祈等等举措，元代皆罕见实行，然而，石刻史料证明，逢旱涝祈岳镇海渎在元代确很常见。

岳镇海渎是山川神祇之大者，故必首先祭祀，而随路山川神祇也同在祭祀之列。如元人虞集记述，“因陝右旱，行省台臣使人告于朝。天子使专使（翰林学士普颜实

①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第54—55页。

②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祭祀·霖雨不止享祭》，第323页上。

③ 王恽《冬旱请祈雪事状》，《秋涧集》卷八九，第450—451页。

④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第182页。亦见刘敏中《平宋录》卷中，《守山阁丛书》本。

⑤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第2889页。

⑥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第184页。

⑦ 《皇太子燕王嗣香碑记》，《道家金石略》第1102页。

⑧ [元]张光大《救荒活民类要》“禱祀”条，明刻本。

⑨ 《大唐开元礼》卷三《祈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立)持玉币礼其山川”。普颜实立前往陕西,祭祀的神祇除西岳、西镇外,还有当地的太一元君、高山太白峡灵湫庙、凤翔之雅腊满神之庙等。^①

二 元代中后期的问题与变化

与《元史·世祖本纪》相比,其后诸帝本纪中关于岳镇海渎祭祀的记载大幅减少,但记载减少并不意味着祭祀减少。实际上,忽必烈为岳镇海渎祭祀定立典范,其后诸帝踵事增华,元人称之“列圣相承,有隆无替”^②。元文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称,“自世祖皇帝,累降明诏,以次加封,岁时遣使礼焉”^③。元顺帝时成书的《析津志》仍称“每岁驰驿至彼,代祀行礼”^④。元末陶宗仪亦云“朝廷于岁首例遣使祭岳渎。”^⑤同期的碑记中也有“每岁春泮遣使”的记载。^⑥可见,每年一次代祀在元末仍是通例。之所以在本纪中的记载少,原因是“大率徼福之举居多,故不悉载”^⑦。翻检史料即可发现,相关记载在《元史·列传》中有一定数量,而在碑刻、诗文中尤多。元末广州南海庙的一通碑文称“国朝自至元二十八年(1291)始祀南海,祀必有记”,而至正十五年(1355),两位使臣到达南海庙,“历考前所存者,才三分之一”,因为当时一些祠庙石料匮乏,常“易旧为新”——将一块碑的旧碑文磨去重刻新碑文,而且这种做法颇为普遍,“踵弊为常政”^⑧。所以当时祠庙中的碑文已有很多散佚,而能留传至今的则更少。即便如此,我们藉由金石书籍、方志、文集而得到的碑文,仍然颇为丰富。由史料来看,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变化。

首先,代祀使臣扰民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元世祖朝,曾因太子真金有疾,“遣侍臣李众驰祀岳渎名山川。太子戒其所至郡邑,毋烦吏迎送,重扰民也”^⑨。可见元世祖朝可能就存在代祀使臣骚扰地方的情况。世祖朝以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元典章》载大德七年(1303)监察御史上报的一个案件:两个前往西岳代祀的使臣,“别无开到正从人数,所过州县预报,致令官府出廓伺候,连日妨夺公务;又令官吏准备茶食祇待”,并且“经过站赤除正分例外,多要羊肉等物,纵令总领将秦川驿等处站

① 《诏使祷雨诗序》,《道园类稿》卷一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512—513页。

② 刘源《祀恒岳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第77页。

③ 《经世大典·礼典总序·岳镇海渎》,《元文类》卷四一。

④ 《析津志辑佚》,第59页。

⑤ 《南村辍耕录》卷二四“木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页。

⑥ 李好文《重修河渎庙》,光绪《永济县志》卷一七,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⑦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七四《郊社十·祀山川》。

⑧ 《代祀南海庙记》,同治《番禺县志》卷三〇,清同治十年刻本,第19—20页。

⑨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第2889页。

司王思明等驱打、剥脱衣服”，对地方官府以及站赤造成了极大困扰。^① 还曾发生过驿站人员不堪忍受代祀使臣的殴打而使使臣杀死的案件。^② 以至泰定二年（1325），浙西道廉访司上言：“四方代祀之使，弃公营私，多不诚洁，以是神不歆格，请慎择之。”^③ 扰民，不仅是代祀使臣的弊端，也是整个元代使臣的通病。^④ 况且，元中后期遣使代祀的权力已经严格收归最高统治者独有，易言之，代祀使臣是代表最高统治者前来行祀事，地位尤为崇高。代祀使臣到达地方时，“其守令率其属，发传除道，迎入府舍，躬导至祠”^⑤，毕恭毕敬，岂敢冒犯？甚至出现了假冒使臣也无人敢怀疑，“有诈称降香使臣，所过迎接护送，莫敢谁何”^⑥。

其次，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显现出来。岳镇海渎象征着至高皇权，世祖朝至成宗朝已严令禁止诸王僭祭。然而据元中期的公文反映，每年春季有民众“百万余人”聚集到东岳泰山，“或称祈福以烧香，或托赛神而酬愿”。在官府看来，民众对东岳神的狂热崇拜，一方面属于僭越祀典，亵渎神灵，另一方面，大量民众连日聚集，有滋生事端的隐患。所以又颁布规定，对于岳镇海渎，“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⑦。

第三，代祀使臣的人选发生变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留下了“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的体例。有学者认为，终元一代，道士始终牢牢掌握五岳祭祀的代祀权。^⑧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顺帝年间成书的《析津志》称“用文翰清望之臣”^⑨，同为顺帝年间刘源撰《祀恒岳记》称“选勋臣旧子，清望朝士”^⑩。与至元二十八年体例作比较，便可发现顺帝时的二则记载都没有专门提及道士。虽然道士代祀仍见于史料记载，但所谓“文翰清望之臣”、“清望朝士”是明显偏向了儒士。据笔者统计，元中后期的代祀使臣大多是翰林院、集贤院官。出现了很多的文人

① 《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迎送·迎接》，第307页上。

② 苏天爵《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第183页。

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第654页。

④ 使臣扰民问题，可参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272—276页；苗冬《元代使臣扰民问题初探》，《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⑤ 虞集《送赵虚一奉祠南海序》，《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⑥ 吴澄《故承直郎崇仁县尹胡侯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三九，第629页下。

⑦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杂禁·禁投醺舍身烧死赛愿》，第558页。

⑧ 周郢《全真道与蒙元时期的五岳祀典》，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4—292页。

⑨ 《析津志辑佚》，第59页。

⑩ 刘源《祀恒岳记》，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一三，第94页b。

儒士代祀,知名者如焦养直^①、虞集^②、周仁荣^③、张起岩^④、揭傒斯^⑤、周伯琦^⑥等等。至顺三年(1332)甚至有集贤院臣请求“岁时巡祭岳渎祈为百姓育谷,宜以儒臣充。”^⑦儒士在岳镇海渎祭祀中的地位之上升,与元中期以后科举的恢复有关,朝中儒臣的数量、地位皆有所提高。而《祀恒岳记》中的“勋臣旧子”,则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的“重臣”相呼应,其中有大量的怯薛代祀,见于史料者如必阁赤塔的迷失^⑧、必者赤寺奴、怯里马赤脱烈^⑨、速古儿赤廉捏绵八哈^⑩、奉御奥兀刺赤唐兀歹、速古儿赤观音奴^⑪、速古儿赤领四怯薛必阁赤庆童^⑫、御位下必阁赤僧宝^⑬等等,难以逐一列举。代祀使臣除怯薛、翰林官、集贤官、道士外,亦有来自御史台、秘书监、太府监、大司农司、广惠寺、宣政院等机构的。

尚需专门讨论的是道教在岳镇海渎祭祀中的地位变化。森田宪司先生在《关于元朝的代祀》一文中,曾将“道士巡历岳渎”单独作为一类列出。以森田先生举出的李志常、张志仙、祁志诚、萧居寿、张留孙、吴全节、赵嗣祺等人而言,这些著名道士的代祀确实有特殊性,他们的巡历,往往不依照既定的岳镇海渎制度进行,重点在于祭祀道教名山。^⑭皇帝给与他们这样的特殊性,着力凸显对该道士的优待。当然,尚有一部分道士的代祀,是很典型的年度代祀,如南海庙代祀碑记中有一位“天倪体真明玄大师、中岳庙住持提点、玄门诸路道教所较录曹德仁”^⑮,北镇庙碑记中有一位“太虚玄静明妙真人王天助”^⑯。从时段上看,元初,道士几乎全权代理了岳镇海渎名山大川的祭祀,如元宪宗朝全真掌教李志常的代祀被称为“凡在祀典者,靡

① 《元史》卷一六四《焦养直传》,第3860页。

② 虞集《代祀西岳至成都作》,《道园学古录》卷三。萨都刺《次韵送虞先生入蜀代祀》,《萨天锡诗集》,《四部丛刊》本。马祖常《和袁伯长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岳镇江河后土》,《石田文集》卷三,第565页下。

③ 《元史》卷一九〇《儒学传二·周仁荣传》,第4347页。《元祭南镇昭德顺应王碑》,《两浙金石志》卷一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4册,第10594页。

④ 《代祀北镇之记》,《满洲金石志》卷四,第17319页。

⑤ 黄溍《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四部丛刊》本。《南镇代祀记》(后至元五年),《越中金石记》卷九,《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7326页。

⑥ 周伯琦《近光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王沂《祀济渎北海记》,《伊滨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祀中镇崇德应灵王记》,《霍山志》,第171页。

⑨ 《祀南海王记》,同治《番禺县志》卷三〇,第7页。

⑩ 《御香碑记》,《满洲金石志》卷四,第17318页。

⑪ 《登极祀岳碑》,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一三,第78页a。

⑫ 《皇帝登宝座祀北岳记》,《道家金石略》第1161页;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一三,第80页。

⑬ 《泰定代祀记》,《道家金石略》,第1160页。

⑭ 《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观记》,《道家金石略》,第959页。

⑮ 《代祀南海王记》(泰定四年),同治《番禺县志》卷三〇,第11—12页。

⑯ 《代祀北镇碑》,《满洲金石志》卷五,第17338页。

神不举”^①。而世祖朝末期以降，道士们失去了山川祭祀的独占权，虽然仍参与代祀，但是总体地位已与元初不可同日而语。

余论

岳镇海渎作为传承了千年的国家祭祀，往往与王朝的正统性相关联。在金与南宋对峙时，双方都施行岳镇海渎祭祀，就有争夺正统的意味。尤其对于由北方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尤为重要。蒙元王朝对岳镇海渎的崇祀，就有“君临汉地”的文化符号意义。这个符号对于汉地的统治者、士大夫、庶民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蒙古统治者对岳镇海渎的一些细节又不求甚解，如对西海、北海的实际地理意义毫不追究，祭祀形式直接照搬汉地旧制。以元代与金代、清代相比，金、清都曾用汉制祭祀其祖地长白山，而蒙古本土的山川祭祀未受到汉制影响，可见蒙元统治者对汉文化接纳程度较低，始终保持着“内蒙外汉”的特点。岳镇海渎祭祀，更多地是蒙元王朝“治汉地，用汉法”的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岳镇海渎祭祀在蒙元王朝的统治下，亦表现出带有蒙古色彩的独特之处。其一，岳镇海渎之所以较早被蒙元王朝接受，因其与蒙古人固有的山川信仰接近。^②在宗教祈福的层面，蒙古人有切身的需求，所以他们会派遣宠近的怯薛、道士前去祭祀。元初屡有蒙古诸王僭祀岳渎，而在对汉文化懵懂无知的蒙古人眼中这多半只是祈福之举。其二，相当数量的蒙古官员担任过代祀使臣；常祀是由地方长官（按元制，地方长官一般为蒙古人）率领官员“全体出动”行祀。^③蒙古官员在岳镇海渎祭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凸显着蒙古人至上的统治秩序。第三，恰恰是在汉文化水平不高的蒙古人统治下，岳镇海渎神得到了空前绝后冗长的封号，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以其封号太滥，全部予以取消，只称某岳之神、某海之神。

岳镇海渎，因其每年由中央向地方遣使这种形式，而成为联接中央与地方的重要纽带。使臣途经广阔的地域，除自身的祭祀使命外，还要考察当地的年成丰凶、地理险易、民情习俗，荐拔人才，考察治迹。^④以此构建了中央与地方的交流。元末，因江淮一带的动乱，中央与广州地方一度交通不畅，至正十五年（1355），终于有代祀使臣再次来到广州南海庙，碑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溪蜚峒獠，罗拜道侧，或至

① 《重修终南山清太平宫记》，《道家金石略》，第518—821页。

② 蒙古的山川信仰，参〔意〕图齐、〔德〕海西希，耿昇译《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08页。

③ 〔日〕森田宪司《元朝における代祀について》，《东方宗教》第98号，2001年，第28页。

④ 虞集《司执中西游漫稿序》，《道园类稿》卷一九。

垂泣曰：不图今日复睹天使威仪，誓死不敢从乱矣。”^① 这段文字出自代祀使臣之手，不免有夸大之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维持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方面，代祀无疑发挥了作用。

自南北朝以来，道教一直试图改造国家祭祀，道教的积极干预，使岳镇海渎染上了浓重的道教色彩。^②元初岳渎祭祀，同样是得力于道教的大力推动，岳渎祭祀的道教化达到巅峰。而元世祖中后期以降，由于道教政治境遇的变化，岳镇海渎祭祀中道士的地位日趋没落。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因此而消褪。日本学者樱井智美揭示，元代北岳庙一贯由道教徒管理。^③实际，岳镇海渎祠庙除个别设有日常职守的（如南镇），其他都是由道士管理的。^④而唐代设九品岳渎令，宋代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⑤都是官府管理祠庙。可知金元之际道教势力在各地急速发展，以至将许多祠庙占据。这使元代官府不再直接管理祠庙，而是借助地方道教势力。而对于地方民众而言，岳镇海渎祠庙由道教管理，无疑是为岳镇海渎增添了道教色彩。

本文的讨论将岳镇海渎作为一个整体，将其视为汉代以来形成的国家祭祀的一个重要门类，^⑥主要是以官方祀典为考察视角。应注意的是，有的岳镇海渎单体在民间亦有信仰体系。如陈高华先生有专文介绍元代的东岳崇拜，东岳庙的祠祀遍及南北，^⑦再如后土、西岳、济渎等亦分别受到某些地域民众的信仰，而各神祠在不同时代亦有兴衰变迁。这些都已超出了官方祀典的范围，涉及到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变迁、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的交叉与互动，显示出鲜活的生命力，是今后研究中应重视的问题。

（作者马晓林，1984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0年6月8日

① 《代祀南海庙记》（至正十五年），同治《番禺县志》卷三〇，第19—20页。

②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04页。

③ 〔日〕樱井智美《元代的北岳庙祭祀とその遂行者たち》，〔日〕气贺泽保规编《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社会——北朝隋唐を中心に》，第132页。

④ 如《通制条格》载，东岳泰山庙“朝省选差年高有德清洁道士主管祠事”、“差廉干道官充提点”。方龄贵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42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83页。

⑥ 秦汉岳镇海渎祭祀的变化，参田天《东汉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⑦ 陈高华《元代的东岳崇拜》，《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4期，2000年。